

读史三编

汪荣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讀史三編

榮祖自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史三编/汪荣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ISBN 978-7-208-15751-4

I. ①读… II. ①汪…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1478 号

责任编辑 李 远

封面设计 陈 酌

读史三编

汪荣祖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
插 页 5
字 数 259,000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51-4/K·2822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史学编

- 在西风下省思中华史学的走向 / 3
- 论史学求真的疑惑与可能 / 26
- 环球史学开创未来 / 68
- 历史生态学试论 / 104
- 论地方史研究 / 112
- 陈垣史学风格 / 126
- 史家陈寅恪的自我 / 144

史事编

- 施琅与台湾 / 205
- 论辛亥革命的三股主要动力 / 221
- 论张学良最长的软禁 / 263

文化编

- 通中西文化之隔 / 295
- 利玛窦传统与辅仁学风 / 310
- 后科举时代的科举幽灵与文化断层 / 320
- 新文化的南北之争：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 / 330

史学编

在西风下省思中华史学的走向

虽然后现代风潮的高潮已过，但史学受此冲击之后，已非原来面目，今后之发展有待观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经过后现代风潮之后，应该如何省思吾华史学研究，走出自己的路。后学理论彻底否定现代西方史学，挑战西方学术霸权，实有助于我们反省长期以来华语世界过度追随西方史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回顾百年以来，我们刻意追求西方现代史学，几无批判即承受。统而言之，一误于梁启超仰慕西方的“国民史”(national history)，轻率视旧史为“帝王家谱”而否定之；二误于套用西方一元理论，曲解旧史；三误于傅斯年轻信西方科学，欲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结果画虎不成，沦史学为史料堆砌的大事记。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与检讨。

溯自海通以来，中国现代史学一直借鉴与模仿西方史学，而不是从传统史学转型而来，因而于三十余年间，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

了全方位的变化。^①所谓全方位的变化，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倾斜。中国史学原有其流长之渊源，却在西洋史学的启示与影响之下进入“现代”，并相随不舍。西洋史学继16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动，以及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开始“现代化”。史学在西方的现代化导致学院治史，史学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史学工作者得以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职业，奠定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制度。故现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备有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使历史研究人才与文献资料能够集中，而不再为政教服务，或不再沦为贵族的余兴。学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由专人负责，历史写作成为信而有征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教训式、空谈式，或纯描绘的叙事。学院化与专业化之后，历史学被认为是严密而精致的学问，随着现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之要求，逐步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乃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②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三化”，自有其强大的吸引力。

早在20世纪之初，西洋学制即在中国推广，历史成为西式的学科，不仅经史分途，传统史学更被视为陈旧落伍、不足取法而渐遭漠视，甚至鄙弃。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始于现代学术制度建立之前，戊戌变法那年有了现代化的京师大学堂，20世纪之初的梁启超与章太炎间接从日本引进西方进化论史观，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整体看

①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②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的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21页。刘龙心受此启发写成专书，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此书可证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史学教育之全面西化。

法。梁启超于 20 世纪之初，首先打出“新史学”的旗号，针对中国传统旧史学而发，不啻是一篇现代史学的宣言。他在西学的影响下，以现代民族国家史的观点批判中华帝国史为“帝王家谱”，以演化论批判传统史观之停滞不前，影响所及，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合理性，破坏甚大^①。所以梁氏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变法维新，而是要革旧史学之命，其严厉谴责传统史学，几欲将之全盘否定。直到梁氏晚年执教清华大学之后，成为学院中人，才奠定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但其方法基本上仍是从西方转借。民国以后的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经与史逐渐分途，史学成为自立门户的学门，并在大学里建立专业的学门。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首先建立“史学门”。除了晚清派遣的留学生带回新概念、新方法之外，老师宿儒在现代学院的环境里，无论教学还是研究，也与传统学风渐行渐远^②。自此，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遂与得现代风气之先的西洋现代史学，常相左右，相随不舍。

中国史学之学院化始于“五四”之前，然在学院里仍不如国文与外文两学科之独立与自主，甚至仍将历史学附属于国学。北京大学建立史学门之后，其课程建制完全仿效西洋上古、中古与近世的分期方式，唯课程内容尚未如当时西方之专业化，如教上古史的陈焕章仍是旧时代的通儒，尚非现代史学专家，既无明确的史学范畴，也无信史观念；教中国中古史的戴锡章也是国学家，亦非专业的史学家。教近世史的杨栋林主要讲故事，也无专业之可言。西洋史课程虽由庚子事变后留学东西洋之所谓“新学之徒”传授，但并不一定是史学专业。比较专业的

① 参阅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 年 1 月，第 20—29 页。

② 参阅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课程有叶涵的艺术史与李大钊的史学史^①。所以，已经学院化的中国史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基本上仍然没有专业与独立自主之可言^②。“五四”之后，新史学随新文化而蓬勃发展，出现以整理国故为焦点的史学运动以及史学专业期刊。整体而言，中国现代史学在观点上以及方法上一直仰赖西方史学。

“五四”之后，由于西式学院与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史学更日趋西化，无论在方法上或理论上，唯西法是从。晚清学堂初设之时，犹中西兼顾，若张之洞草拟《奏定学堂章程》，以及《劝学篇》一书中都提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香涛之意原在循序渐进，学“西学”之前先把“中学”学好，才不至于忘本。然而张之洞的“体用说”，常被扭曲为“牛体马用”，纠缠不已，遂成中西学对立之势，维护中学被认为是提倡西学的障碍，故非去中学不足以兴西学。新学堂无论在课程的内容或安排上，也越来越成为洋学堂的翻版，清朝学部于1906年已感受到“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駸駸乎有荒经蔑古之患”^③。难怪晚清学人已甚感西学之势张、中学之势微，担心中学之将亡^④。民国以后，学堂更名副其实成为洋学堂，历史教育与历史书写莫不刻意模仿西方。

民国元年明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已完全仿效西方学制，传统学问成为洋科系研究的材料，不是独立的学门，在旧时代列为诸学之首的经学，在新学堂已被肢解，分属各学科，甚至被消灭于无形。“五四”之后，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易名为史学系，

① 据当年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夏德仪的回忆，夏先生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的发展》，第225—226页。

③ 见潘懋元、刘海峰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④ 详阅刘龙心：《学术与制度》，第23—29页。

正式与西方历史教育制度接轨，开拓西洋史课程，并渐以讲授西洋史的方法来讲授中国史。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①；事实上是取代而非改革，因所执行者乃积极学习欧美的新史学，未暇对中国旧史学作深刻的反思与检讨，而是将以新汰旧作为要务。何炳松于1917年自美留学归国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创办《史地学刊》，大力提倡美国的“新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则于五四之后创办《史地学报》，也成为宣传和译介西方现代史学的重镇。北京、南京之外，其他各地的新式学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的指标，但无论宣传或译介，终不免流于游谈无根，并不能就此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的理论体系。

西洋现代史学崇尚实证，讲求信史，中国现代史学之考证方法，貌似呼应乾嘉朴学，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而几尽取自欧美，尤以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马首是瞻。兰克的史学方法论着意于不以今论古，留德的姚从吾从早年在北大到晚年在台大一直强调其“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之说，以档案文献辨伪考证，重建历史真相，都是在响应兰克，并非承继实事求是的乾嘉考据学风。兰克在柏林大学举办讲座时，建立史学“研讨班”（seminar），大开依据档案资料研究历史之风，国内外学子闻风向慕，他也被公认为“现代史学之父”^②。中国现代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也是在响应兰克实证学派的方法论。兰克写有史学专著约六十部，久无一部完整译为中文，其史学仅为极少数中国学者所熟知，然其史学方法经过伯伦汉（Ernest Bernheim, 1850—1922）所著《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① 转引自刘龙心：《学术与制度》，第136页。

② 参阅汪荣祖：《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0页。

Method) 以及法译简本与日译本的转介, 对“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学界无论在学制、史观、史学方法以及历史书写上, 都极力追随其法。举凡依据档案资料写历史, 实证求真, 书写如过去所发生之事等等, 几照单全收, 奉为经典。姚从吾所讲授的史学方法, 不出以兰克为主的德国语文考证观点。陆懋德在清华、辅仁等大学亦以集兰克史学方法大成的伯伦汉名著来讲授, 并认为西方的内外考证均胜于乾嘉考证学与传统的训诂学^①。顾颉刚于二战后回顾当代中国史学, 虽极为简略, 读如书目简介, 但已可探知其中消息, 史料的考订、发现与整理, 显然是大势所趋^②。

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对中国现代史学之影响既然如此深广, 故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名家, 莫不重视原手史料与史事考证, 如孟森钩沉爬梳, 从史料中考订清室的先世, 满洲名称的由来、八旗制度的性质, 以及厘清清初诸多疑案, 诸如太后下嫁多尔衮、顺治帝出家、雍正夺嫡等等, 即孟森所谓“以异代订定史事虚实”^③, 无不在回应西方实证史家追求历史上的客观真相。陈垣重视史料之抄本、刻本, 以及纠谬正误, 包括在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史源学以及史讳学上的奠基工作, 也都是为了增强求真的工具。他的研究重点在宗教史, 最大的成就也在厘清客观真相, 例如考订开封的犹太族群在元朝以前并无记载, 自元至明才改用汉姓, 到明中叶的一赐乐业教, 才兴盛起来^④。研究隋唐史的岑仲勉自谓“史之为学, 不外摹写

①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 上海独立出版社 1945 年版, 第 42—43、52—53、59 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167 页。

④ 详阅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65—108 页。

实状”^①，认为既往的历史是一客观存在的实状，可容史家摹写，故其大力扩充史源，考证辨讹，例如确定黄巢事迹，考证四镇始末，推论均田制之确曾施行等等，莫不在求史事之真相。胡适更将西方科学（实证）方法与讲究考据的清代朴学相提并论，强调史料乃是考证真相的命脉。顾颉刚受到胡适的影响，从辨伪入手，以建设真实可靠的古史。他指出伪古史系统是由层层累积起来的神话与传说所造成，并打破中华民族出于一元的传统看法。^② 向达以研究唐代东西交流史闻名，亦以材料之完备与文物考订之精详著称，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③，除充分利用传统史料之外，亦广取新出土文物、敦煌写本，甚至实地考察遗址，勤作田野调查，揭示唐代长安受到西域文明影响的方方面面，在方法学上不出实证主义的范畴。韩儒林更自西欧汉学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成就颇大，如一一考证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与部落之名^④。

兰克的史学方法强调原手史料，于是中国现代史学有所谓“史料学派”，有了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之说。近人因而误将傅斯年归于重视与处理史料的所谓“史料学派”^⑤，其实傅说的实质意义是要建立科学的史学，他想以充分的史料来建设科学的历史，若无充分可信的史料，根本谈不上重建史事，提出解释，或建立史观，所以必须在充分又信而

① 语见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1948年），第281—313页。

② 参阅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2—112页。

③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④ 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⑤ 例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七章所论。

可征的史料基础上书写历史，才会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根据可靠的原料立说而具有科学性。民初考古的丰收，特别是殷墟甲骨出土以后，更加强了以实物重建科学信史的信心。傅斯年的信心显然来自当时西方史学的科学风，如英国史家伯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所谓“史学乃不多不少之科学”（[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①。在此所谓的科学，实指精准的自然科学，若不将科学一词视作自然科学，泛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则任何学科都是科学，便无意义。英美史学界也多误会兰克实证史学就是科学的史学，乐观地相信完全客观与信史之可能性^②。风尚所至，自19世纪以来，在科学主义的所向披靡下，西方现代史学也一意追求科学化，希望历史学能像自然科学般精确。傅斯年留学英国，于归国途中，即已致书顾颉刚，以“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③相勉。众所周知，力学（即物理学）与生物学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傅斯年欲将历史力学化、生物学化，即由此而来。傅氏归国后，极力推行史学之科学化，但试行并不成功，结果流于史料排比的窘境。其实，将史学科学化在西方也成功不了，伯里在晚年也不得不抛弃前说，自认“科学的历史”之不可能，甚至说，“即使有人能写出完全没有偏见的历史，那也是枯燥无味之作”^④，真不知将置其长期追随者于何地。

① 见 John Bagnell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pp.223, 210.

② 详阅汪荣祖：《史学九章》，第60—63页。

③ 见《傅斯年选集》第3册，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408页。

④ John Bagnell Bury, *Selected Works*, p.70.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85—286.

马克思唯物史观也来自西方，对中国现代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马克思主要根据西方历史经验提出全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说，从原始公社或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阶段的物质基础是“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一方面是生产力，由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组成，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关系，由劳动力与社会组织形成。两者本身的不稳定与内部矛盾导致变动，生产潜力将会影响一切，使新起的阶级取得主导地位^①。马克思学说似乎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提出了科学性的一元规律，故当被引进到中国时，也被视为是科学的史学。近人不断将所谓马克思“史观派”与傅斯年的“史料派”视作中国现代史学里对立的两个主要学派^②。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傅斯年及其追随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但都在搞史学的科学化，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自有其精辟之处，然绝不能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李大钊引进唯物史观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③成为以马克思理论治史的开山之作。他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阶段，即西周前之原始公社、西周奴隶社会、始于春秋时代之封建社会，以及鸦片战争以后之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设定的前四阶段，最后以共产社会为终极。然而各阶段未必能适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各阶段之分期，遂难有

① 马克思史观的扼要综述可阅 David McLellan, ed., *Marx: The First 100 Year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pp.57—102。

②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1979年第1期第2页。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月刊》1941年第4期第1—36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定论，故有美国学者认为不啻是将“中国史穿上马克思的外衣”^①，并不相配。其实，自二战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在西方或日本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数十年来，马克思史学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无可动摇的科学的史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界几无交集，将历史文化经验迥异之中国历史，纳入“普适”的科学公式，必定会发生以论带史的流弊，诚如一位大陆史学工作者沉痛指出：“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②沉重的代价至少一部分是为了追求所谓科学的历史而付出的。

无论将马克思唯物史观还是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视为科学的历史，皆属误解，马克思理论是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本质上有别于自然科学。兰克所谓的科学方法，无非是重视原手史料，强调档案的重要性，以便实证求真，认为凡无直接证据者皆不可信^③。兰克从未认为历史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然此误解并非仅属中国，美国亦然，倡科学的历史学者，亦见诸 20 世纪初之西方，然科学的历史毕竟可望而不可得，有如无法实现之“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虽然中国现代史学在理论上、风格上、方法上，以及书写上不时有所变化，但实证主义的基调不曾动摇。无证不信引发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风潮，亦来自西潮，对中国古史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否定，无怪乎顾氏倾心于长素先生“上古茫昧无稽”的卓识。他虽知康氏为了改

①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p.14—44.

② 见张广智：《西洋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1 页。另参阅 Helmut Fleischer, *Marx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③ 笔者已有详细论证，详阅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0—32 页。

制，“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①，却无视长素为了政治目的而在学问上过于武断，反而变本加厉，几欲全盘推翻古史，提倡西方人所谓的信史，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破坏多于建树，直至晚近中国才走出“疑古时代”^②。

当中国现代史学陶醉在客观真实的历史可得的美梦之际，被引为准则的西方史学界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创立于19世纪晚期的美国历史学会原意建立在兰克模式之上，信奉“客观真实”(objective truth)，认为任何带观点的历史书写都有违“那个高贵的梦想”。然而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出现“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挑战科学的历史；强调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相，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写他自己的历史，也只能有相对的真相。美国史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采用经济史观点治史，早于1935年就在《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文章，质疑兰克模式与所谓客观真实、挑战并反对以史为致用的“守旧派”(the Old Guard)。不过，他虽不认为客观真实之易得，但仍须努力追求客观真实，依然强调档案数据，以及考订与征信之重要^③。然而诺维克(Peter Novick)所欲修正的高贵梦想在历经七十春秋之后，还是宣告失败^④。史学的科学化既已失败，唯有少数历史哲学家，仍然在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的科学法则。西方主流史家遂退

① 见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4页。

② 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Charles Beard, "That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 (Oct.1935), pp.74—87, 86.

④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e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6.